

# 环境变化与 可持续安全的构建<sup>\*</sup>

李淑云

**【内容提要】** 可持续安全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其核心假设是: 我们无法控制非安全因素带来的所有结果, 但必须努力解决其根源。气候变迁、资源竞争、南北问题以及全球军事化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动因。随着气候变化由科学问题转向高级政治, 环境合作由制度建设提升为可持续理念, 包括各种安全概念在内的可持续安全与环境机制的互构, 使可持续安全的实现成为可能。作者通过对可持续安全概念的界定和辨析, 提出加强全球环境治理, 推进制度建设; 实现全球环境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国际合作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是构建可持续安全的三条主要路径。强调气候变化、核威胁以及未知却可预见的危机已经使人类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为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安全状态, 必须正视环境和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安全威胁, 在制度框架下加强国际合作, 建构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

**【关键词】** 吉登斯悖论; 气候变化; 环境合作; 可持续安全

**【作者简介】** 李淑云,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沈阳 邮编: 110136)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11) 09 - 0112 - 24

<sup>\*</sup> 本文系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政治转型战略调整研究”(项目编号: 10JJDGJW010)、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辽宁省资源环境特征及化解途径分析”(项目编号: 2009R28) 和辽宁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资源有效利用”(项目编号: 2009401020) 的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 一 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界定

环境变化涉及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纯粹的自然环境变化,包括气候、生态、自然资源等物质性条件的硬变化;二是因自然环境变化引发的行为主体关系的变化,包括国家间关系、地区和全球安全、人的安全、国家战略安全观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环境变化导致诸多环境问题出现,而“环境问题本质上是指人类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其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威胁,主要涵盖包括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贸易与环境等内容。虽然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解决方法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都认为环境可以对安全产生重大影响”。<sup>①</sup> 2011年举世震惊的“阿拉伯之春”的根本动因是由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粮食危机。而生物燃料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它的出现使气候变化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趋复杂。同样是在2011年,曾经作为替代化石原料最佳能源的核能,因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使得核安全再次成为世界焦点。这一切也引发笔者对安全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深入思考:如何在利用能源之时确保环境安全?如何避免因环境变化引发气候变暖、粮食问题、水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从而引发安全危机?如何保护和改善已经遭到破坏、濒临“引爆点”<sup>②</sup>的地球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安全?如何预防安全威胁,从源头遏制不利于安全因素的出现?当解决安全问题的传统“控制范式”引起质疑,从根源上解决安全威胁的“预防范式”引起关注时,可持续安全作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需要引起全球重视。本文将探索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安全建构的内在联系。

### (一) 吉登斯悖论与可持续安全的提出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政府、学界、公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气候灾害的报道不绝于耳。冰川融化、气温上升、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海啸、飓风、洪涝、旱灾等极端天气称霸,因气候变暖导致“因热生病”对人类健康的损害,使得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直观感受越来越明显,对气候变化可能给地球家园带来的危机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

<sup>①</sup> 于宏源《环境变化与权势转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sup>②</sup> 气候变化的“引爆点”在科学家看来就是“2℃阈值”。所谓2℃阈值是指必须将全球温度较工业革命前的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才能避免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逆的威胁人类生存的改变。其物理意义是指气候系统发生质变的一个临界点,超过2℃阈值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参见葛全胜主编《公民行动——气候变化中的人类自觉》,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既不希望澳大利亚干旱出现,也不愿看到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变成草原;既担心摧毁新奥尔良市的卡特里娜飓风的再次上演,更恐惧日本福岛地震后放射性核物质的泄露;既未曾想到北冰洋在短暂的时间里可能融化,更不愿设想一些地区被海水淹没……但气候变化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也会随着环境的恶化逐渐地显现。当这种变化达到“引爆点”时,一切补救措施都将无济于事。这种危险“既无影也无踪,但潜在的后果又是灾难性的”。<sup>①</sup> 这就是吉登斯悖论产生的背景。

吉登斯悖论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造成的一种困境。其核心假设是“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sup>②</sup>

吉登斯悖论与“青蛙效应”<sup>③</sup>原理相同。其启示在于,在人类行动的“瞻前顾后”中,强化了“顾后”命题的重要性,即可持续问题。当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极端天气在全球不断出现后,环境安全和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当吉登斯悖论开始在现实中显露出某种迹象,促使人们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后果。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便由原来的“无视”到现在的“重视”,乃至发起气候变化的政治变革。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为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sup>④</sup>这种视野就是可持续安全。

现有的资料显示,可持续安全的概念是在2003年正式提出的,但可持续安全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欧洲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以“罗马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增长的极限》<sup>⑤</sup>、《人类处于转折点》<sup>⑥</sup>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可持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307页。

③ 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实验。试验人员把一只青蛙放进沸腾的水中,青蛙因突然遇热而立即跳出,并得以逃命。试验人员把这只青蛙重新放进常温水中,然后慢慢加热。这次温度的上升是缓慢的,但却是持续的。青蛙虽然感受到水温的变化,却因没有意识到危险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等它感到热度难耐时,已经失去了自救能力。“青蛙效应”说明,当危险慢慢降临时,人们很难将其与未来的威胁相联系,而当意识到威胁时,一切已无法挽回。社会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未来贴现”。

④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7页。

⑤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ø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A Report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30年后更新和扩大的版本于2004年出版,参见Donella Meadows, Jørgen Randers, and Dennis Meadows, *The 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 Vermon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4。

⑥ [美]梅萨罗维克、[德]佩斯特尔著,梅艳译《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续发展的思想,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如生态退化带来的灾变)。<sup>①</sup>《增长的极限》的结论是:如果当前世界上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在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增长极限将会到达。概率最大的结果将是在人口和工业水平上出现一个突然不可控制的下降。报告认为,改变这些增长趋势和建立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稳定条件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的可能设制是为了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且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实现个人潜能。在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五个方面的威胁中,人口、食物生产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还处于增长状态,它们每年沿着这样的模式增长,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自然的极限。由此可见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性。

1972年,在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前,由来自58个国家的152位成员为大会准备的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生存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破坏、食物的缺少、人口增长等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事情了’,如果不加以关注,‘人类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sup>②</sup>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sup>③</sup>的报告,其中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该报告全面阐述了安全与发展和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指出“传统上理解的安全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因为在“不安全的实际原因中,还包括不能持续发展这一因素”。报告强调,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错误的政策和漫不经心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出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以改变。同样是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问世,气候变化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sup>④</sup>列举了人类面临的“六大全球威胁”:“人口失控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移民、环境恶化、毒品生产和走私、国际恐怖主义。”进入21世纪后,环境恶化、气候问题举世瞩目。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吸引着全球的注意力。在世界各地,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出

① 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

② [英]芭芭拉·沃德、[美]勒内·杜波斯著,《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载《中国人口报》2005年5月11日。

③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④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1994/>.

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问题,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既有的政治思维方式确实需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sup>①</sup>

克里斯·阿博特(Chris Abbott)和索菲·马斯登(Sophie Marsden)在《走向可持续安全》<sup>②</sup>一文中指出,可持续安全主要研究不安全的相关而长期的动因:气候变化、资源竞争、大部分地区边缘化(南北问题)以及全球军事化。气候变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大幅度流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的出现。英国可持续发展智库E3G的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尼克·梅比(Nick Mabey)在《管理气候安全》<sup>③</sup>一文中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与冷战结束一样,促使战略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将跟世界大战一样巨大,而且将持续数百年之久。气候变化导致资源消耗的剧增和全球能源竞争日趋白热化。资源竞争不仅局限于现实中的能源争夺,还将延伸到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及其他生物资源的争夺,世界范围内的动荡地区将扩大。气候变化还将导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使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化。由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显得日益狭小:荒漠化和海岸线后退造成土地减少;世界资源数量也在不断降低。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国际竞争势必会加剧”。<sup>④</sup>而气候变暖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差异。由于南北国家所处的历史境域和发展水平不同,使得生存主义者追求的“一个地球”向着“一个世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在遭遇“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sup>⑤</sup>的现实之后面临尴尬。气温升高将使一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化,面临着更加贫困的危险。据统计,在全球最贫困的十亿人口中,亚洲国家占50%。<sup>⑥</sup>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分化将导致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化。而武力作为安全措施的广泛使用及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在内的军事技术的扩大,呈现出全球军事化的趋势。

①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5页。

② Chris Abbott and Sophie Marsden, “Toward Sustainable Security,”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700>, 2009-1-21.

③ Nick Mabey, “Managing Climate Security,”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84>, 2009-1-15.

④ 葛全胜主编《公民行动——气候变化中的人类自觉》,第47页。

⑤ 蔺雪春《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治理机制》,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7页。

⑥ 全球最贫困的十亿人口中,印度大约占26%,中国占16%,其他亚洲国家占18%。参见葛全胜主编《公民行动——气候变化中的人类自觉》,第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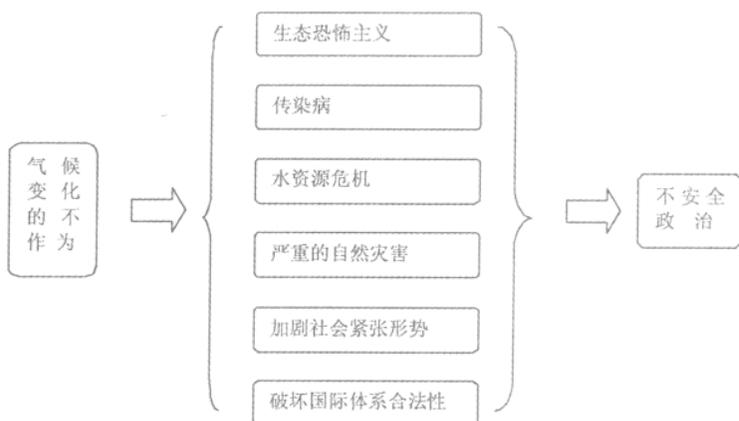


图1 气候变化威胁导致不安全政治

气候变化、资源争夺的后果导致环境制约经济增长,贫富差距的扩大、来自边缘地区的反抗和恐怖主义战争的出现等加大了未来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参见图1),于是可持续安全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安全概念相机被提出并逐步引起重视。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可持续安全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安全的可持续状态,在界定可持续安全之前,有必要对“安全”和“可持续”概念进行简单梳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安全”是形容词,有三层含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sup>①</sup>一般而言,“所谓安全,主观上是指不存在担心外来攻击的恐惧感,客观上是指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sup>②</sup>在传统安全占据国际政治领域主导地位的时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客观上没有受到威胁,在主观上没有对可能失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担忧和恐惧以及维护这种状态所具有的能力”。<sup>③</sup>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安全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他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sup>④</sup>

“可持续”意指持续性和均衡性,描述的是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状态,也可以理解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

② 李瑛《多极化时代的安全观: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第42页。

③ 杨万明《论综合安全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第1页。

④ 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5页。

为一种科学发展的理念。“最简单意义上的可持续意指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我们应寻找持久的方案,而不是短期的决定。我们必须仔细思考中长期方案,并推出一定时限范围内要达到的中长期战略。思考今日的政策会给尚未出生的那些人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这是一种责任。”<sup>①</sup>20世纪60年代末,环境、人口、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显现,引起联合国的重视,于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受到关注。“可持续”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悖论,为确保“可持续”,就要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否则就会影响到发展;而如果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势必会影响到“可持续”。“可持续”与“发展”的关系犹如古语所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强调的重心是不一致的。“环保主义者取其‘可持续’之意,而政府和企业(在实践中)却把重点放在了‘发展’上面,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来表示其义。”<sup>②</sup>联合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逐渐被各成员国认可,并成为指导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如果说生态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的话,那么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定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威廉·拉弗蒂(William M. Lafferty)和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James Meadowcroft)认为“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关切:提高人的福利;满足基本的需求;保护环境;考虑到后代人的命运;实现富者与贫者的公平;在决策时力求有多方参与。”<sup>③</sup>

何为可持续安全?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撒捷夫·卡哥拉姆(Sanjeev K. hagram)、威廉·克拉克(William C. Clark)和达纳·费亚斯·拉德(Dana Firas Raad)在2003年发表的《从环境和人的安全到可持续安全与发展》的论文中指出“可持续安全囊括环境安全、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解决不同层次上安全问题的安全理念。”<sup>④</sup>文章强调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论证了对于安全的威胁和机遇,考察了不同种类的理论框架,总结了经验中的教训,并得出交叉框架、联合变革、密不可分( interlock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和分解目标的手段可用来实现可持续性安全。

①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72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72页。

③ William M. Lafferty and James Meadowcroft, eds.,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④ Sanjeev Khagram, William C. Clark and Dana Firas Raa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o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2003, pp. 289-313.

英国布莱德福德大学教授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与英国牛津大学的牛津研究小组(Oxford Research Group)<sup>①</sup>共同开发可持续安全概念,并于2006年成立了关于可持续安全的网站。<sup>②</sup>罗杰斯的定义是“可持续安全作为一种可供选择并且是寻求处理根本问题的安全概念,在社会经济语境里,它也包括基本的国际贸易改革,使穷国能不受限制和歧视地参与贸易,也是其很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sup>③</sup>罗杰斯希望在21世纪可持续安全概念能成为解决社会经济分化和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学者之外,有些学者的观点与可持续安全的观点相吻合。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和彼得·哈斯(Peter Haas)综合近几年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全球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其二,当前处理环境问题的努力尚显不足。其三,需要新的和主要的自主能力(initiatives)的应用。他们还揭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动因:人口、贫困、科技消费和当前的市场体系。最后的结论是,处理决定性动因而非仅仅治愈问题的表象,是处理全球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sup>④</sup>在美国和欧洲还有很多团体、学术团体和研究小组支持可持续安全概念,并且将可持续安全作为公众呼吁和改变环境安全状况的诉求。他们在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政策和传播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sup>⑤</sup>

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认为“‘可持续安全’的定义是指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长期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客观状态。‘可持续安全’不仅涉及如何防止社会动乱、冲突、战争等政权与国家危机,也涉及如何避免生态灾难、核灾难等全球安全问题,是涵盖国与国、国与人、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整个全球系统人类持久安全的战略问题。”其范畴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国内和国际两大方面。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避免国家安全状态受到威胁而中断。<sup>⑥</sup>

笔者认为,可持续安全就是要改变以“控制范式”为主的安全理念,是对以往安全观的重构;是把环境安全和人的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现实安全与长期安全、国家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同时作为安全考核目标,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各种可能的安全

① 英国牛津研究小组(ORG)成立于1982年,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智囊团。

② <http://sustainablesecurity.org/what-sustainable-security>.

③ Paul Rogers, *Global Security and the War on Terror: Elite Power and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206.

④ James Gustave Speth and Peter Haa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6, p. 139.

⑤ 这些组织机构有:边境安全(Border Secure)、边境安全交流计划(Border Security Communications Project)、魁北克政府合作计划(Government of Quebec Partnership)、北美下一个(North America Next)和加拿大墨西哥学者合作计划(Collaboration with Canadian and Mexican Scholars)。

⑥ 刘江永《世界需要“可持续安全”》,载《北京周报》2010年7月29日。

威胁。可持续安全既是一种安全状态,也是一种新的安全观念,更是全球共同追求的安全目标。可持续安全是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由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和个人共同参与下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全人类利益的体现。

### (三) 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区别与联系

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一样都是价值观的体现,是安全观念的时代反应,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产生,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综合安全是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基础上,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力的扩大和地区安全组织及安全机制的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所谓‘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有两层特殊的含义:第一,从安全内涵上看,综合安全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第二,从行为主体观察,综合安全需要把范围扩展到比国家(state)更大的层面。”“它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sup>①</sup>可持续安全是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引起人们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担忧之后,对安全观的重新诠释,是对综合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内涵有许多相同之处,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安全,也包括生态环境安全。

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区别在于安全角度不同、重点不同、理念不同、范式不同。第一,两者强调的安全角度不同。综合安全主要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安全内涵的多层面和不可分性;可持续安全的初衷就是对安全理念进行重构,引入普遍安全、全面安全、人类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概念,从人、国家、环境等多个角度,解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第二,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尽管综合安全观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将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纳入人类整体安全的范围中,但其重点是在“安全”上,目标是要消除现实的安全威胁,维护和平;而可持续安全是在综合安全基础上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念,侧重的是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是对“和平即安全”观念的升华,强调的是发展的安全,是从更高层次、更高境界对安全观的理解,是从源头上来消弭安全隐患,其核心假设是以非安全因素为前提。第三,两者的安全理念不同。以经济安全为例,可持续安全和综合安全都包含经济安全,但综合安全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持续安全则更多地强调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影响。面对能源和环境危机,以综合安全角度来考量,用核能替代化石原料是经济安全的体现;但以可持续安全来考量,安全的目标尚未达到,因

<sup>①</sup> 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5-7页。

为核能替代化石原料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隐含着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更大可能性,日本的核泄漏就是典型例证。第四,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的根本区别是范式不同,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是从“控制范式”向“预防范式”的转变。无论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反恐斗争,还是北约在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抑或是日本福岛核泄漏后的疏散措施,都是在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控制措施,皆属于安全领域的“控制范式”。英国牛津小组的可持续安全观指出,目前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方法,被“控制范式”所主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反恐战争”,也就是主要目标是对不安全和恐怖施加限制,而不管根源问题的做法。牛津研究小组认为这些对待安全问题的方法在深层上是有瑕疵的,而且也是世界上的政治家无法去对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威胁创立出现实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式。<sup>①</sup>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也在《全球化,安全和民族国家》中论述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矛盾体的时代,这种二元矛盾使人 与社会走向相反方向。一些范式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在不断进行矫正。财富在扩展,而贫困却随处可见。新科技增加人们的舒适感,而不安全却无处不在”。<sup>②</sup>

如何改变这种不安全现状,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希尔曼(David Shearman)和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W. Smith)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环境危机,已经走到了自身尽头,人类要自救就要创立新制度”。<sup>③</sup>这种制度创新就是实现从控制到预防范式的转变,即构建可持续安全战略。

## 二 既有研究及不足

可持续安全的研究既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给人类提出的崭新课题,也是环境与安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引申和发展。目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具体研究现状如下:

### (一) 国外的相关研究

关于环境与安全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早将环境纳入国家安全领域的是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1968年,卡尔·多

<sup>①</sup> “What Is Sustainable Security?” <http://sustainablesecurity.org/what-sustainable-security>.

<sup>②</sup> Ersel Aydinli and James N. Rosenau,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the Nation-State: Paradigm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1.

<sup>③</sup> [澳]大卫·希尔曼、约瑟夫·韦恩·史密斯著,武锡申、李楠译《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sup>①</sup>一书中,将人口、生态、环境、粮食等12个基本问题引入国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的内涵开始扩展。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26项原则中指出“人类及其环境必须免受核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响。各国必须努力在有关的国际机构内就消除和彻底销毁这种武器迅速达成协议”,环境安全开始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1977年米塞·杰拉尔德和米塞·帕特里夏合著的新作《迈向人类世界秩序:超越国家安全束缚》<sup>②</sup>问世,同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主任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了《重新界定国家安全》(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sup>③</sup>一文,开始将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联系到一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sup>④</sup>报告中指出,国家曾经为争夺和控制原料物质、能源供应、土地、河谷、海洋通道及其他关键性环境资源而发生冲突。随着这些资源越来越稀缺,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该报告正式使用“环境安全”一词。1989年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thews)在《重新定义安全》中论证了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即自然资源、人口和其他环境变量将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巨大影响,继而成为政治稳定的潜在杀手。<sup>⑤</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进一步提高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其《和平议程》讲话中告诫说,生态破坏对世界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sup>⑥</sup>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各国及区域组织加强了安全战略研究,北约提出,“对盟国安全的威胁不大可能来自精心策划的针对盟国领土的侵略,反倒可能来自某些不稳定……而安全与稳

① [美]卡尔·多伊奇著,周启鹏译《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② Mische Gerald, Mische Patricia, *Toward a Human World Order: Beyo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itjacke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7.

③ Lester R. Brown,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Worldwatch Paper 14*, Washington, D. C.: Worldwatch Institute, 1977.

④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⑤ Jessica Mat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1989, pp. 162-177; 转引自于宏源《环境变化与权势转移》,第16页。

⑥ Boutros Boutros - Ghali,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 - 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31 January 1992 General Assembly A/47/277 - S/24111 17 June 1992.

定特别具有环境因素”。<sup>①</sup>

环境安全作为人们研究后冷战时期安全问题的重要视角,不仅有“环境和安全倡议(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nitiative)”这样的网络平台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载体,而且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等杂志也不断刊载环境安全方面的文章。一些研究安全问题的书籍同样会涉及环境安全。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和迪·怀尔德(Jaap De Wilde)三人合著的《新安全论》<sup>②</sup>就以一章的篇幅来阐述环境安全议程。进入21世纪后,有关环境安全的研究已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2002年,美国威尔逊中心出版的《环境变化与安全报告》(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gram Report)<sup>③</sup>将酸雨、生态资源匮乏、温室效应、自然灾害、核污染等问题直接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

在环境问题与安全关系的研究中,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就是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气候变化与安全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也是学术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外有关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以美国最具代表性,突出特点就是发展迅速,成果频出,研究力度较大,尤其是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进一步加强。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相关部门的研报告频频问世。2004年2月,美国国防部于2003年10月委托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完成的“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sup>④</sup>曝光;2007年4月,美国CNA公司<sup>⑤</sup>拟制的《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威胁》<sup>⑥</sup>发表,同年11月份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sup>⑦</sup>合著的《后果降临的时

① Kent H. Butts, e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DOD Partnership for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pecial Report, US Army War College, 1994; 转引自刘东国《国际安全的新领域:环境安全》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50页。

②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gram Report 8*, Prince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cholars, 2002.

④ Peter Schwartz and Doug Randall,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edf.org/documents/3566\\_AbruptClimateChange.pdf](http://www.edf.org/documents/3566_AbruptClimateChange.pdf), October, 2003.

⑤ CNA公司的前身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公司被视为服务于美国海军和其他国防机构的、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政策和发展中心。

⑥ The CAN Corpo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http://securityandclimate.cna.org/report/National%20Security%20and%20the%20of%20Climate%20Change.pdf>. 2007年4月出台的这份《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威胁》报告,是由从四大军种中选出的11位在此之前退役的三星和四星将军共同完成。

⑦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华盛顿原有的智囊团,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是美国国家安全智囊团,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气候变化研究。

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sup>①</sup>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sup>②</sup>先后推出。上述报告分别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破坏、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出现的情景及对国际和美国安全的影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等视角阐述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同样是在2007年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发布了《气候变化：一个安全风险》<sup>③</sup>的报告，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问题、粮食问题、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产生，而环境问题影响国际安全。

与此同时，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澳大利亚学者艾伦·杜邦(Alan Dupont)和格雷姆·皮尔曼(Graeme Pearman)在2006年撰写的《地球升温：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sup>④</sup>研究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引发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导致移民的出现，能源、水资源和粮食的短缺，并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其核心观点是：气候变化是最终的安全威胁。但遗憾的是，气候变化更广泛的安全影响被公共政策、学术和媒体极大忽视并严重低估。据科学家预测，如果地球温度持续上升，一些小岛国和沿海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将被海水淹没。而位于南亚的孟加拉国，1/3的土地有被淹没的可能。基于此，印度学者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国家间冲突方面。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气候变化与南亚安全：对国家安全含义的理解》<sup>⑤</sup>中指出，气候变化对南亚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化引起水资源危机，从而加剧印中之间、印巴之间的冲突。印度学者尼京·派(Nitin Pai)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印度应为新的冲突可能性做好准备》<sup>⑥</sup>中提出了同样的关切，认为不能排除因气候变化引发印度与周边国家间发生冲突。

① Kurt M. Campbell, Jay Gullledge, et al., "The Age of Consequences: 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http://www.csis.org/media/isis/pubs/071105-ageofconsequences.pdf>.

② Joshua W. Busby,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 Agenda for Action," CSR No. 32, November 2007.

③ 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Climate Change as a Security Risk," <http://www.wbgu.de/wbgu-jg2007-engl.pdf>.

④ Alan Dupont and Graeme Pearman, *Heating up the Planet: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Lowy Institute Paper 12, Double Ba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6; <http://lowyinstitute.richmedia-server.com/docs/AD-GP/ClimateChange.pdf>.

⑤ Brahma Chellaney,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in Southern Asia: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RUSI Journal*, Vol. 152, No. 2, 2007.

⑥ Nitin Pai,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eparing India for New Conflict Scenarios," *The Indian National Interests Policy Brief*, No. 1, 2008.

在国外众多学者有关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的研究中,有几本著作颇具代表性。一本是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委员会成员的格温·戴尔(Gwynne Dyer)撰写的《气候战争》<sup>①</sup>一书。作为世界顶级地缘政治分析专家,格温·戴尔就气候变化对我们社会和生活的影响进行了醍醐灌顶式的分析,透过七大预测及对联合国关注气候议题、签署《京都议定书》、世界各国对气候变暖议题所持有的态度以及应对变暖过程的详细记述,得出的结论是,气候战争的硝烟已经近在咫尺了,因缺水、干旱与高温将在世界各地引发战争。另一本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撰写的《气候变化的政治》<sup>②</sup>一书。该书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快,而且气候变化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吉登斯在书中引入了“气候变化政治学”、“污染者付费”、“绿色运动”、“谨慎原则”、“过度发展”、“政治敛合”、“经济敛合”一系列新概念,并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中,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评价该书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还有一本书是由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希尔曼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合著的《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sup>③</sup>,该书将气候变化与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讨论的是近乎肯定的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民主社会在应对方面的失灵”。作者提出,严肃地对待环境危机意味着彻底批判民主制本身。为了向可持续的社会转变,自由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专家组成的威权政府”。

在环境变化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可持续安全作为一种新的观念被提出,并将之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牛津气候小组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该研究小组成员对可持续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研究气候与安全的关系。尼克·梅比(Nick Mabey)的《管理气候安全》(Managing Climate Security)、<sup>④</sup>克利奥·帕斯卡尔(Cleo Paskal)的《变化中的安全气候》(The Changing Security Climate)、<sup>⑤</sup>卡尔·波普(Carl Pope)的《地球安全告急》(Security Alert for the Planet)、<sup>⑥</sup>克里斯·阿博特(Chris Abbott)和索菲·马斯登(Sophie Marsden)的《走向可持续安全》(Toward

① [加]格温·戴尔著,冯斌译《气候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大卫·希尔曼、约瑟夫·韦恩·史密斯《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2009年版。

④ Nick Mabey, "Managing Climate Security,"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84>, 2009-1-15.

⑤ Cleo Paskal, "The Changing Security Climate,"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262>, 2007-8-23.

⑥ Carl Pope, "Security Alert for the Planet,"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757>, 2008-2-29.

Sustainable Security)<sup>①</sup>是近年来相关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阿博特和马斯登认为,“对亚洲和澳洲来说,观念的转变能够开创一个时代,促进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的地区秩序形成”,要消除非传统安全产生的根源,有一种方式就是“可持续安全”。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环境与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描述性研究成果,二是大多数的研究是属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但无论是描述还是理论探讨,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比较透彻,对环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具有如下特点:

从研究重点看,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具有纵向发展特点。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21世纪初,环境安全问题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骤然升温。从2003年起,英、美学者开启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安全研究的新阶段。

从研究主体看,在环境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中,相关国际组织、政府、智库和学界共同发挥作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气候变化与安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像美国国防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英国牛津小组、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等,则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气候变化与安全方式、程度、范围及需要采取的对策进行综合分析。学界则更多地从理论视角进行学理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在环境与安全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安全的研究极少涉猎,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 (二) 中国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从事环境变化与安全问题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环保界和气候界的人士以及年轻学者和大学生。最早出版的相关著作当属曲格平的《关注中国生态安全》<sup>②</sup>一书,该书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应该提升到中国国家高度。2005年,解振华主编的《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sup>③</sup>问世,把气候变化作为中国环境安全的重要威胁。此后,余谋昌的《生态安全》<sup>④</sup>、王金南等人的《环境安全管理:评估与预警》<sup>⑤</sup>等著作相继问世。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海滨2010年出版的专著《气候变化与中国国

<sup>①</sup> Chris Abbott and Sophie Marsden, "Toward Sustainable Security,"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700>, 2009-1-21.

<sup>②</sup> 曲格平《关注中国生态安全》,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③</sup> 解振华主编《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sup>④</sup> 余谋昌《生态安全》,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sup>⑤</sup> 王金南、吴舜泽、曹东、周劲松、张天柱《环境安全管理:评估与预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家安全》<sup>①</sup>该书提出了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领土面积和国土质量、对中国民生、对中国主权、对中国重大的国防和战略性工程以及军队建设等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著作。另一部是于宏源在2011年出版的《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该书“结合中国自身情况,以国际环境制度、外交和大国博弈为研究切入点,解决中国环境外交所面临的气候能源等难题”,“重点研究大国在气候、资源冲突、环境贸易等领域的互动,从气候能源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国际环境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演进过程、环境公共物品的大国集体行动、对大国气候环境外交的相互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sup>②</sup>在学术论文中,刘东国的《国际安全的新领域:环境安全》<sup>③</sup>和张海东、罗勇等合作的《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sup>④</sup>较具代表性。刘东国通过对环境安全战略产生、发展及构成的梳理,阐述环境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指出用综合安全弥补军事安全的不足是未来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张海东和罗勇等人则从气象灾害的角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与国外相比,中国学者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气候中心副主任侯勇指出,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报告中,只有88篇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被引用,占引用参考文献总数的1.41%。这说明,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待加强。

中国关于可持续安全的研究几乎和国外同步,但从事相关问题研究者寥寥无几。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江永教授。2004年,刘江永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文章通过对“安全异化”现象的分析,提出“可持续安全”是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命题,在对可持续安全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安全战略进行全方位解读,成为中国研究可持续安全的先锋。<sup>⑤</sup>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对环境变化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起步晚、成果少、研究人员少等特点。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随着安全观念的变化,以非传统安全为视角,

① 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② 于宏源《环境变化与权势转移》,第2页。

③ 刘东国《国际安全的新领域:环境安全》,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49-54页。

④ 张海东、罗勇、王邦中、董文杰、王志强《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年第2期,第85-88页。

⑤ 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45-49页。

将气候变化作为非传统安全的组成部分。关于可持续安全的研究则是从对美国安全异化的研究入手,强调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战略层面建构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性。而本文所涉猎的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安全问题目前在中国鲜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尽管可持续安全概念已经提出,但研究尚有待深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可持续安全的概念还存在分歧,没有一致认可的概念;二是对影响可持续安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分析有待深入;三是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安全带来的威胁,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之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发展的现实,对可持续安全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深刻分析了可持续安全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可持续安全的三条主要路径,最后得出必须正视气候问题的影响、在制度框架下加强国际合作、建构可持续安全的结论。

### 三 可持续安全的构建路径

可持续安全的中心假设是:我们无法控制非安全因素带来的所有结果,但必须努力解决其根源。可持续安全属于“预防范式”,天生具有预防性,因为它能在恶性结果尚未被感知时就把冲突和动荡根源消弭于无形。<sup>①</sup> 可持续安全超越了传统安全分析演化的理论框架,力图去寻求处理不安全因素产生的根本原因。如前文所述,产生不安全因素的根本原因包括气候变化、资源争夺、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全球军事化以及因贫富差距导致的贸易体制不合理和边缘化等问题。对此,控制范式和预防范式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因方法不同其结果也大不相同。

从图2(见下页)模型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控制范式是通过军事力量或遏制政策来消除或控制不安全因素,进而维持现状;而预防范式是力图解决根源问题,将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以确保可持续的安全状态。针对诱发可持续安全的动因,可持续安全的主要构建路径如下:

#### (一) 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推进制度建设,实现全球环境公平正义

全球环境治理的前提是实行国际环境合作。“国际环境合作问题实际上是将集体行动应用到国际体系中的特例。”全球性环境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2年在瑞典

---

<sup>①</sup> Chris Abbott and Sophie Marsden, *Tigers and Dragons: Sustainable Security in Asia and Australasia*, London: Oxford Research Group, November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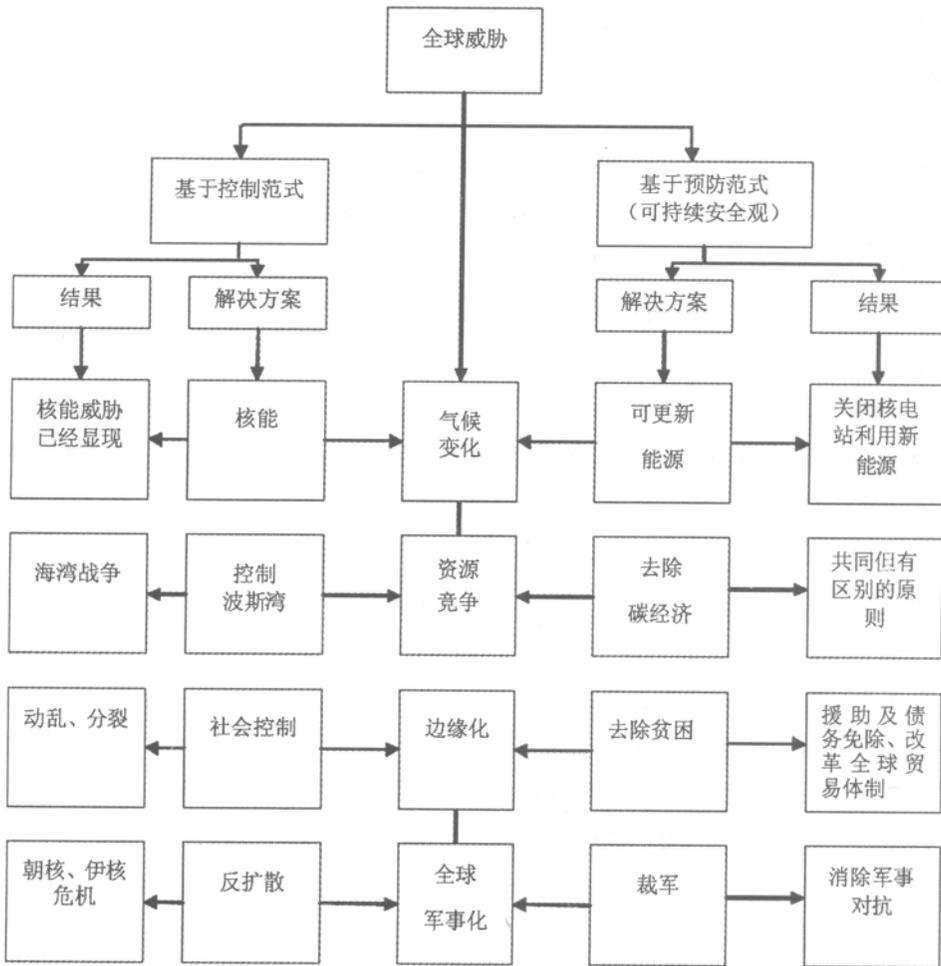


图2 控制范式和预防范式面对全球威胁的解决方案和结果之比较

资料来源:该模型是在克里斯·阿博特和索菲·马斯登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控制范式和预防范式(可持续安全观)在面对全球威胁时的解决方案和结果进行比较。参见 Chris Abbott and Sophie Marsden, *Tigers and Dragons: Sustainable Security in Asia and Australasia*, 2008。

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在环境保护史上更具有里程碑作用。大会把环境问题纳入国际议程,就26项基本原则和109条行动计划建议形成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开启了南北双方共同协商并联手治理国际环境问题的序

幕。因此,这次大会被视为国际环境机制正式确立的主要标志。<sup>①</sup>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成为国际环境合作的制度基础。经过1979年的《世界气候大会宣言》、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1世纪议程》、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02年地球峰会的《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已经形成。尽管在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解读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但其核心要素是一致的,即“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边环境协议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资金机制”。<sup>②</sup>

环境机制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机制论的延伸,是机制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是环境合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好体现。国际环境机制对环境改善和促进国际合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国际环境机制发生了持续且明显的变革和演化,有欧洲学者将国际环境机制的创立和改变的研究分成权力使用型、理性自我利益追逐型和科学知识影响型。<sup>③</sup>奥兰·扬(Oran R. Young)将机制分成自发型秩序、协调型秩序和强加型秩序三种。目前的国际环境机制研究主要是针对协调型机制展开的。<sup>④</sup>爱德华·迈尔斯(Edwards L. Miles)将有效机制的构成划分为三个自变量:问题类型、问题解决的能力和背景。<sup>⑤</sup>西方对国际环境机制评估越来越具体化和功能化,对国际环境机制的有效性的研究成为核心。

环境和气候变化给人类可能带来的威胁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力量解决。而环境机制建设为解决此类问题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事实证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建立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sup>⑥</sup>各国通过签署国际环境条约和协议的形式来建立和完善环境机制,截止到2010年已经有近300份国际环境条约和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 2003*, Oxford: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xiv.

<sup>②</sup> 薄燕《全球环境治理的有效性》,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12期,第57页。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认为,全球环境机制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集合;二是国际环境法;三是资金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报告中表明,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突出要素包括:一是多边进程;二是多边环境协议;三是全球环境治理的资金机制。

<sup>③</sup> Lasse Ringius,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at Sea: Public Ideas, Transnational 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Environmental Regimes*, The MIT Press, 2001, p. 1.

<sup>④</sup> Oran R. Young, "Regime Dynam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277-297.

<sup>⑤</sup> Edwards L. Miles, *Environmental Regime Effectiveness: Confronting Theory with Evid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p. 163.

<sup>⑥</sup> 薄燕《全球环境治理的有效性》,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12期,第56页。

协议诞生。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机制在改变社会行为和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有效性”,而不是如机制初建时一般,关注机制是由谁发起和制定的。环境机制既是实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前提,也是实现全球环境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安全的制度保障。

公正和道义是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必须确保全球环境公平。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气候公平可以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国内公平与国际公平等多种形式,概括而言包括国与国、人与人两个层次。目前气候公平原则争论的焦点在于国际公平上,即国与国之间需要在效率需求和公平原则之间找到平衡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上存在严重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的气候问题主要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应承担减排任务,而发展中国家无须强制减排。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之际,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曾有一句至理名言,“贫穷是最大的污染”,也就是说环境问题不是发展过度造成的,而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印度代表提出的“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的概念,指出如果所有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都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同水平,今天的世界就不会面临全球变暖的威胁。公平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削减人均排放量的基础之上。对此,发达国家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和印度因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增加,中印两国的排放增量与发达国家的减排量相抵消,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实行减排政策。

所谓公平,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原则,是对全球碳排放权力和空间的分配,需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各国协商解决,这就需要制度规范,需要通过国家合作来实现。

如何才能实现环境公平,夯实可持续安全的基础?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首先,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要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减缓碳排放,并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预防环境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实现可持续安全。其次,需要观念的创新,要放弃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的理念,把可持续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

## (二)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构建可持续安全状态

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同等重要的命题。在环境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思想慢慢浮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

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sup>①</sup> 1987年,以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它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sup>②</sup> 可持续发展概念在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15届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得到接受和认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认为,可持续发展涉及国内合作和跨越国界的合作。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国家内和国际间的公平,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加强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及经济增长。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本届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此后,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什么是可持续?简单说就是生存和发展,具体包括:生命的维系、种族的延续、文化的传承、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资源的有效和长久利用以及保有必要的生存领地等。可持续发展“列举了人类在未来岁月中必须面临的贫穷、温室效应、遗传物种多样化的明显减少、臭氧层耗竭、森林消失、沙漠化等严重挑战,并认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实际是一个危机”。<sup>③</sup> 由此可见,可持续安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延伸,是安全观念的创新。从可持续安全的概念来看,既涉及环境安全、人的安全,也涉及国家安全,“通向国家安全的更积极一步是彻底的可持续安全,它本身是以国家、人和自然的复杂互动为焦点,并且环境的价值是在于其本来的安全的保护”。<sup>④</sup>

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关联的框架,“概念和务实的框架始终将安全和发展密切结合”,“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权利和风险视角下的紧急框架为可持续安全提供了物质基础”。若想保持可持续安全状态,就必须实行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

<sup>①</sup> 转引自蔺雪春《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6页。

<sup>②</sup>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计划司环境规划编写组《环境规划指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4页。

<sup>③</sup> James Gustave Speth and Peter Haa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p. 139.

<sup>④</sup> Sanjeev Khagram, William C. Clark and Dana Firas Raa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o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2003, pp. 297-309.

联合变革。联合变革不仅能够得到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团体等各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支持,也使可持续安全和发展进程成为可能,最终发展成政府间的制度安排,成长为成熟的国家战略。

### (三) 以日本核危机为警示,以国际合作促进新能源发展

2011年日本核危机爆发后,核泄漏给人的安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可持续安全状态遭到破坏,也使人们重新认识核危害。此前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危险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核扩散。极端势力或国际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搞核恐怖活动。二是美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sup>①</sup>即使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两次核泄漏事故,而且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sup>②</sup>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十分严重,但灾难的发生并未引起利用核能国家的足够重视。一些人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原因归咎于苏式低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有问题。核能作为替代化石原料的新能源,因其具有清洁、高效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仍在大力发展和使用核能,这表明1986年苏联核泄漏事故的发生并未影响核电的继续使用。不仅如此,许多国家都计划在未来继续增加核能的发电量。

近几个月来,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使“核安全”成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问题,各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核能利用存在着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危险。一旦遇到不可预见的事件(包括天灾和人祸),核泄漏、核污染就是不可避免的。更为关键的是,一旦核能发生事故,哪怕是微小事故,都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且难以逆转。为此,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数天及数周内,各国政府都在重新思考利用核能的政策,一些国家的新的政策已经出台。日本核危机最大的政治影响不在本土,而在另一个大洲的德国。在核能发电量占1/4的德国,对核能利用政策的转变力度最大,政策最为明确。在日本核危机发生之前,德国政府费尽周折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颇受争议的法案,该法案的宗旨就是要延长德国反应堆的使用寿命。日本核泄漏之后,德国政府态度发生180度转变,不仅立即关闭掉7个老化的核反应堆,而且宣布计划最迟到2022年关闭所有核反应堆,彻底取消核电的使用,尽快步入可再生能源时代。德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占到50%,2040年达到65%,2050年则超过80%。德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气候政策是任何可持续发展

<sup>①</sup> 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47页。

<sup>②</sup>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造成30人当场死亡,逾8吨强辐射物泄漏,核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造成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最大一次灾难。

政策的基石。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交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能源技术合作中受益。德国将会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等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

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或重复利用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先进技术大多为发达国家所掌握,而发达国家无论从减排的历史责任角度,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角度,都有责任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掌握、利用新能源。目前,区域内或国家间的新能源合作已经初现端倪,未来的发展之路虽然不会一路坦途,但合作发展空间巨大。

核能在许多国家能源利用中占有的比重较大。在短期内要完全放弃核能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核泄漏的日本也未放弃核能利用计划。如何确保核能的安全?国际组织和各国需要通力合作,不仅要建立核反应堆的统一设计标准,克服费用、废料处理和对核扩散关切的挑战,对核能的使用实行国际统一监督检查机制。还要逐步以清洁、安全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核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安全。

## 四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气候变化已经发展到人类不得不正视的程度,人类对气候安全、气候政治的关注呈现上升趋势。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在《大暖化》<sup>①</sup>中指出,气候变暖已经不是环保爱好者的专属议题。在富有远见的战略家眼里,这一问题已与粮食、能源、环境、交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暖使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版图和文明重新洗牌。尼克·梅比(Nick Mabey)在《管理气候安全》中指出“在我们达到自然系统中的关键‘引爆点’之前,如果不控制气候变化,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结果将超出当前的安全和人道应对能力。”<sup>②</sup>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快,而且气候变化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吉登斯的建议是,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等方面的努力;要将

---

① [美]布赖恩·费根著 苏月译《大暖化:气候变化怎样影响了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Nick Mabey, “Managing Climate Security,”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84>, 2009-1-15.

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sup>①</sup>

第二 国际机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创立是为了满足对治理具体问题的需求。国际环境机制的目标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密切相关。当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时,“贫穷是最大的污染”,可持续模式无法运转;当可持续优先成为可行的发展模式选择时,环境、经济与社会综合平衡才能协调共进。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问题政治化、核扩散和核污染的出现,建立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刻不容缓。环境机制作为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制度平台,促使人类采取共同的行动,从根源上消除可能会产生的安全威胁。从全球范围来看,为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可持续安全的威胁,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企业、个人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为了共同的目标展开了行动。可持续安全由人类自发行动演变为自觉行为,并在制度框架下作为一种安全理念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第三 加强国际合作是建构可持续安全的必由之路。如果把每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比做气候政治博弈的舞台的话,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及措施自气候变化问题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来,就出现了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不断分化重组的现象。因历史境域、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的不同,在气候政治斗争中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三股力量,折射出南北矛盾、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歧和针对排放大国的矛盾。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是历史责任、资金与技术转让。三股力量角力主要围绕减排义务的分担。<sup>②</sup>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基于环境公平正义的考量,发达国家应该认识到历史责任,率先减排,并在资金、技术上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保持经济发展、满足本国人民需要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碳排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召开国际会议、举行国际谈判、签署国际协议等多种形式在发展新技术、寻找替代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等缓解资源紧张状况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以减少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出现,避免因不可再生资源 and 贫乏资源竞争而导致的安全失控状态的出现。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应加强监管体系建设,以期将冲突和动荡的根源消弭于无形,实现可持续安全。

[收稿日期:2011-04-30]

[修回日期:2011-08-02]

[责任编辑:谭秀英]

①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第72页。

② 傅国伟《当代环境规划的定义、作用与特征分析》,载《中国环境科学》,1999年第1期,第72-76页。

tions , Tongji University.

**America's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Tang Shiping and Joey S. R. Long (84)**

**【Abstract】** By synthesizing material forces with ideational forces more organically via a social evolutionary approach , we advanc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post – WWII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We argue that post – WWII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 that is , American elites' and public's support for America'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abroad –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 ideational or psychological forces alone. Rather , two crucial material variables , namely geography and aggregate power amplified by superior technological prowess , are indispens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pens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abroad. These two factors have powerfully shielded American elites and public from the horrendous devastation of war. As a result ,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major states , American citizens and elite have tended to be less repelled by the prospect of war. The outcome is tha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ar more active in military interventions overseas than other major states.

**【Key Words】** 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 America's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 material forces , ideas

**【Authors】** Tang Shiping ,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 SIRPA )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Joey S. R. Long ,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RSIS )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Li Shuyun (112)**

**【Abstract】** Sustainable Security is a new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re hypothesis is that , if governments and NGOs can not control the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 we must aim to solve the root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 competition over resources ,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jority world ( south – north divide ) , and global militarization are all the driving force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With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being moved from the scientific field to high politics ,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lso upgrades from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the idea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 including the mutual building of various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regimes , which makes sustainable security possible to achieve. Through the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be advanced to achieve glob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otion of the new energy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paths to construct sustainable security. Emphasis on climate change , nuclear threat and unknown but foreseeable crisis has led the human beings to a critical moment. To ensure the human society in a sustainable security state , we must face up to the human security threat brought by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 and construct new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Key Words】** giddens paradox , 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 sustainable security

**【Author】** Li shuyun , Professor , Dean of school of IR , Liaoning University; Researcher of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Research , Liaoning University.

### **Politics and Exchange R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RMB Appreciation**

**Li Zilian (136)**

**【Abstract】** It may be more persuasive to explain the RMB apprec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builds a variable coefficient – panel data model with RMB exchange rate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 the 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inflation rate , current account net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s control variables , and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cluding interest group , election cycle , party faction and congressional bills as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data of U. S. , Japan , U. K. , Germany and France from 1995 to 2009 ,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ength prevents RMB from changing with economic fundamentals , thus a paradox existed in RMB one – way appreciation; the U. S.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 and the congressional bills aimed at RMB exchange rate are the blasting fuse in the apprecia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ength , such as interest group , election cycle , and party faction , has made RMB appreciate and sped up its cours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ength , RMB appreciation ,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Author】** Li Zilian , Ph. 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Economy , School of Economics , Nanjing University , Jiangsu , 210093.